

以历史为镜鉴，穿透现实的迷雾

——2023年历史类好书过眼

唐骋华

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反过来理解，当代种种事件都能从历史中找到渊源。作为一个有着丰厚史学传统、高度重视历史书写的民族，我们中国人对此自然有着真切的体会。这也解释了历史书何以能在各类图书榜单上占据重要位置——当人们面对当下的纷繁问题时，总是习惯先“向后看”，以历史为镜鉴，穿透现实的迷雾。那么2023年有哪些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世界的历史书呢？下面，我就略作一番个人视角的梳理。

前人如何应对历史大变局

当今世界，无论科技、经济还是政治、思想，都在经历深刻复杂的变化。当然，这不是人类第一次面临巨变。实际上，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被认为是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做了思想准备。作为第一场现代意义上的思想革命，启蒙运动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300多年来著作层出不穷，以至于研究和书写这场运动本身都足够成为研究对象。关于启蒙运动，似乎已没有太多可以阐释的空间。然而，以新颖视角突破惯常叙事，本就是历史学家的技艺。《启蒙运动中的法国》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种技艺。

作者丹尼尔·罗什为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传人。该学派以长时段、跨学科、问题导向著称，力图拼凑出特定历史时段的“总体图景”。全书分三卷，首先探讨启蒙运动思维中的时间、空间以及社会权力的转移，复次讨论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冲突与现代化，最后揭示普遍性价值的转变。本书涉猎广泛，除常见的宫廷政治、财政经济等，还描绘了法国社会在服饰、饮食、民俗等层面的变化。通过百科全书式的叙述，启蒙运动如何改造法国人的观念进而促成革命，已然呼之欲出。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中译本曾荣获第三届傅雷翻译奖，是一本靠得住的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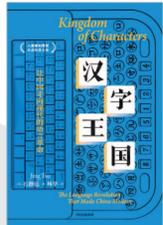
如果说法国启蒙运动是西方现代化转型的经典案例，那么明治维新就是日本



《明治维新史再考》
张先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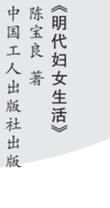
《启蒙运动中的法国》
[法]丹尼尔·罗什 著
杨亚平等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汉字王国：让中国走向现代的语言革命》
[美]石静远 著
林华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无政府：东印度公司的崛起》
[英]威廉·达尔林普尔 著
陆大鹏、刘晚晖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明代妇女生活》
陈宝良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现代化转型的起点。近现代日本取得的成就、欠下的血债，都可以追溯到这里。也因此，明治维新被反复回忆、追问和书写，形成了顾颉刚所说的“层累叠加的历史”。为此，明治维新史研究名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谷博力因拂去涂抹在历史小姑娘脸上的脂肪与污迹，于是就有了《明治维新史再考》。由公议、王政走向集权，去身份化。传统叙事总是浓墨重彩地描绘“维新三杰”“四大强藩”，而三谷博力则明确反对这种英雄史观。在这本书中，他围绕公议、王政、集权、去身份化四个课题，结合国际环境和世界秩序，以幕末日本各方力量（幕府、朝廷、公家、强藩等）不同政见的碰撞、权力博弈的过程为主线，颠覆了固有的历史叙事模式，为读者呈现了一段别开生面的明治维新史。由于关闭了滤镜，将历史的斑点、噪点、裂缝全都展现出来，使本书独具魅力。

明治维新使日本强大，也促使中国这头睡狮惊醒，奋起直追，开启了现代化转型。其过程之曲折艰辛，已经有很多著作展现了，《汉字王国：让中国走向现代的语言革命》一书另辟蹊径，从语言文字的视角对这一过程进行新的观照。

我们每天都接触和使用汉字，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不然。在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中，汉字一度被认为是启迪民智、推进现代化转型的阻碍，简化、改革甚至废除汉字的呼声不断涌现。今天回看，当时人心太急，有些主张也太激进。不过，这反映出面对内外挑战，前人力图让汉字现代化的迫切心情。对此，后人应予以“同情之理解”，而非随意指责。

在《汉字王国》一书中，哈佛大学语言与文明系博士石静远全面描绘了中国人让古老的汉字立见现代世界所做的努力。从倡导官话革命的王照、创制注音符号的

章太炎，到发明中文打字机的周厚坤、林语堂，设计拼音方案的吴玉章、周有光，再到发明计算机激光照排系统的王选……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改良和演进，终于让方块字完全融入了现代世界。

“海洋中国”的失落与东印度公司的崛起

中国古代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最遗憾的莫过于错失了海洋，以至于近代以来，“外敌从海上入侵”成了民族屈辱的记忆。但其实，古代中国也是海洋大国，和东海、南海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也是近年来有关“海洋中国”的历史叙事所重点建构的内容。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杨斌的目光跨越东南亚，投向了更为遥远神秘的印度洋。《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以船、物、事、人四重视角，表明

了从两汉至明清的2000余年间，中国与印度洋世界有着密切的交往。

1600年前，东晋高僧法显从印度洋取道回国。1300年前，唐代高僧义净成为第一位留下姓名的经海路完成中国—印度洋航程的中国人。宋元时代，中国制造的船舶在印度洋上穿梭，一方面带去中国的瓷器和技术；另一方面，印度洋世界的珍品，以及“美人鱼”“人参果”“海底磁山”等故事也传入中国，融入传统文化。这一切，在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大规模活动中达到高潮。然而盛极必衰，郑和之后，中国与印度洋渐行渐远，最终失去了交集。

古代中国如何与印度洋发生连接？又为何会“失去”它？在一艘漂浮出水面的沉船、一件件跨越海洋的物品中，在一幕幕海上往事、一段段海上流言里，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令人扼腕的是，中国退出印度洋之际，英国人正向着这里高歌猛进。自1600年英格兰女王授予印度贸易特权以来，100多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一家商贸企业变成了一个拥有强大军力、控制印度，进而对整个南亚次大陆建立起殖民统治的庞然大物。它俨然成为英帝国殖民扩张的急先锋。然而让英帝国始料未及的是，壮大后的东印度公司反过来侵略了英国本土的政治体制，影响甚至主导了政府政策。到最后，东印度公司彻底脱离母体掌控，成了独立王国。1857年爆发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就与东印度公司不驯英国政府的改革建议，在贪婪的驱使下不断压榨印度人民，致使其奋起反抗脱不开干系。

一家商业公司是如何扮演殖民主义急先锋，并演化为“恶龙”的？为了解这一进程，英国历史学家威廉·达尔林普尔走进大英图书馆和印度国家档案馆，爬梳海量史料，编织起东印度公司的来龙去脉，推出了这本《无政府：东印度公司的崛起》。达尔林普尔重点关注商业与王权的互动，审视了王权如何扶植东印度公司，而后者又如何深刻地重塑了王权。在作者看来，殖民化与商业化这种步调一

致又争权夺利的纠缠史，体现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作为中国人，我阅读本书时忍不住常常掩卷，思索“海洋中国”的失落与东印度公司崛起之间的历史张力。

历史暗角中的人们

在“历史的暗角”中，流淌着多样性的潜流，有待今人发掘。例如，我们对“传统女性”容易有刻板印象。特别是，由于宋元以来社会观念日趋保守，至明代已是登峰造极，因此一般人或许会认为明代女性多是思虑呆板、恪守妇道的“贤妻良母”。其实，只要读过冯梦龙“三言”里的若干篇什，就知道这样的想法多么幼稚——即便在礼教森严的社会，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也是千差万别。只是这种差别，被主流历史的宏大叙事给遮蔽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宝良的《明代妇女生活》将被遮蔽的历史丰富性揭示出来。作者先勾勒了在礼教的禁锢世界中，女性遵从“女德”的群体性人格。到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思想的活跃，女性也开始出现了从“温婉贤淑”到“健妇”的转变，女性自我意识加强，甚至出现了男女平等的诉求。这样的妇女形象可谓迥异于以往常见的描述。

说到暗角，有一些历史时段也处于阴影中，比如五代。或许是五代的情况太复杂，或许是因为它被当作“过渡期”，总之，公众对五代的兴趣和了解少于它之前的唐和它之后的宋。但这是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郑也夫的《五代九章》以社会学家的视角，对五代历史作了重新审视。郑也夫虽然不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学者，但引文详略得当，立论以史料为基础，稳妥而不乏新意，堪称一部带史学理论性质的佳作。

总体来看，2023年的历史类图书，无论原创还是译著，都体现了创作者和出版者深切的现实关怀。他们从历史这座富矿中，为当下的我们开掘出可供镜鉴的宝贵经验。

如何以科学价值解读科学事实争论

李洋

1969年，美国马里兰州的物理学教授乔治·韦伯（Joe Weber）首次宣称探测到引力波之后，科学界便开始了关于探测引力波实验的讨论，同时也开启了关于探测引力波实验的争论。直到2016年，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aser Interferometer Gravitational-Wave Observatory，简称LIGO）召开全球发布会宣布人类第一次直接探测到来自双中子星合并的引力波，才被学界认可为是人类首次探测到了引力波信号。基于此，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张帆所著《当代科学事实的争论研究——以探测引力波实验为例》，沿着科学事实与科学价值两大线索，对探测引力波实验中所涉及的科学争论的类型、产生的原因及其争论解决的过程和机制、探测引力波实验所涉及的科学争论给当代认识论带来的挑战等等所进行的讨论，强调了当代“大科学”实验特征是不可避免的科学争论，且相较于以往，这种争论已经从关于科学发现权、科学奖励机制的外层争论直通科学事实本身。

提升科学价值的地位面对科学事实争论

“大科学”时代的到来，正在向科学共同体发起挑战。在许多自然科学的研究中，科学家在现象被直接观察之前预设一个支撑它的理论模型，随后进行实验设计和实施，最终依据实验数据判断

理论模型的真伪。如果通过实验获得的数据可以证明已观察到的现象，那么这个理论模型也就同时被承认为“可靠的”，由该理论模型所推导的现象也会被承认为真实存在的。在这种模式之下，一些迄今为止纯粹的科学理论被认为是实际意义上的存在，尽管它从未被仪器或人类感官捕捉到，即未观察到现象被当作直接观察到的现象来对待。天体物理学遇见的认识论难题就源于此，无法进行受控干预，科学家只能令自己身处“宇宙实验室”，观察着宇宙本身所做的许多“实验”痕迹，然后根据痕迹重构这些遥远的事实。

个人的力量在这样的宏大科学之中显得异常渺小，对于伟大科学理论的验证必然求助于社会规范，集全人类之力完成。探测引力波实验就是典型的“大科学”实验。LIGO公布探测到引力波的实验结果，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但是有关信号真实性的猜测也层出不穷，使得科学的权威地位岌岌可危。争论已经由曾经的科学外围转移到了科学事实，甚至还触及了如何理解科学事实的底层结构、停止或缓解这样的争论是当代科学回避不了的问题。如何去面对“大科学”实验科学事实带来的争论，无法在理想主义科学内部找到答案，必须利用科学价值跳出窠臼，使科学的目标不再拘泥于追求宇宙真相、客观定理等，而是更多地关注社会的观念、情感和审美。

利用科学价值中的“信任”破解科学事实争论

科学史上的研究方法和认识基础一直在发展和改变。最初，科学家先驱们只是基于一些推测进行了理论建构，用于指导实践，后来由于“实验”的发展，科学变得详细、具体且数字化。中世纪科学引入了“实验科学的特权”，使实验与理论推测保持距离，理论推测发展了理性主义逻辑分析工具，由此产生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在现代科学中的长期对立。我们可以看到牛顿等科学家在综合上述两种方法的过程中一直在使用这两种方法，说明了知识的发现从来都不是纯粹孤立的，每次伟大的科学发现中都用到了这两种方法。“建构”与“实在”从未分离且相互依赖，没有指导和赋予发现意义的理论就没有发现，没有新发现和现象的指引就没有理论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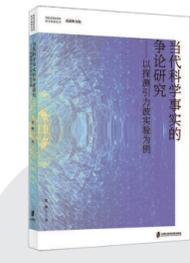
观测引力波实验的核心挑战之一就是观测理论模型的依赖性，而当今的物理学研究中，理论对发现事实已经没有什么有效的帮助了。目前没有其他的天文台能够拥有LIGO实验设备和条件，故而引力波的观测结果至今没有得到科学确证的“金标准”——可重复性。但可重复性是否是当今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值得我们去思考。在“大科学”实验中，可重复性的获得往往需要几辈人的努力。但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不能一直处于对科学的迷惘态度中，想要

对抗长期迷惘只能有赖于本书重点论述的以“信任”为基础的“科学民主”。

从书中所被柯林斯称作“政策倒退”的例子，可以看到“信任”在“大科学”实验执行过程中具有超越以往任何时期的力量。在以前的科学知识传播中，先由科学家简单地陈述事实，再由社会公众捕捉到与自己相关的某些信息，理解其将带来的后果。科学家由于受过学术训练，比外人更接近知识的来源，所以对科学问题的理解比普通人更深入、更全面。虽然在科学发表都需要经历的同行评议过程中，专业知识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但在外人看来那只是一个“黑箱”操作过程，也就自动放弃了在科学领域的话语权。这样的传播方式在今天已经过时了，就目前的科学事实争论来说，必须吸纳社会各界的力量，实现“科学民主”。而实现“科学民主”，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科学家与社会不同主体之间的“信任”，在科学价值上找到共识。

科学必将走向“科学事实与科学价值融合”

想要将科学哲学成果转化为公众知识，对科学价值进行追问是必然要做的工作。本书给出了很好的范例，以讲好探测引力波实验故事为前提，引领读者思考当今科学的危机，很好地帮助了读者跳出以往的认知牢笼，使公众大胆地向科学家提出以下问题：应该如何进行适当的科学研究？什么方法被认为是



《当代科学事实的争论研究——以探测引力波实验为例》
张帆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可靠的？什么样的证据是可行的以及什么应该被视为证据？读者不再将科学事实作为自然现实的一部分，而是将其视为社会整体沟通、互动和谈判的产物；不再自觉地将科学的发现过程还原到科学事实的发现过程，而是认识到科学事实与科学价值纠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科学发现过程。

这本书给我最深刻的启发，是它对争论和不确定性的探讨。作者并没有简单地陈述案例，而是全面展示了科学界内部的争论和可以作为认识基础的科学哲学理论。反观当今的科学家们仍然致力于寻求标准，包括实证验证、借鉴理论、客观性和通用的科学话语。但是，社会各界已看到，在探测引力波实验中存在各种争论中，标准既没有发挥过作用，也不是科学追求的目标。在科学危机的时代，一定要讲好科学的故事，筑好公众理解科学的桥梁，用科学价值阐述科学的真相。而书中最后着重提到的“技能模型”和“专长的规范理论”，就是帮助我们理解自我与科学的联系、将科学事实与科学价值融合在一起的有效途径。

走马楼吴简里的历史风云

和平

简牍是中国古代独特的书写材料，它们是由竹片或木片按照一定规格削制而成，窄的称“简”，宽的称“牍”或“札”。无论官廷还是民间，凡诏书、文书、书籍或簿记、书信等等，都书写在简牍上。1996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对长沙五一广场走马楼建筑工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发现了一批纪年主要为三国孙吴时期的简牍，总数达十万余枚，其中有字简76552枚，此批简牍后被命名为“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简称“走马楼吴简”。

学者估算走马楼吴简总字数将达150万字（一说300万字），远远超过《三国志·吴书》20卷、《建康实录·吴》四卷中所记载的孙吴政权历史的字数。走马楼吴简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包括赋税、户籍、仓库管理、钱粮出入、司法文书、屯田、往来书信及公文、涉及孙吴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诸多方面，为深入研究孙吴历史提供了丰富可靠的资料。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苏俊林所著的《身份与秩序》一书，紧紧围绕“身份、秩序”这两个关键词，通过对走马楼吴简的爬梳，逐渐还原孙吴时期从家庭结构到基层吏治、从户口管理到政治格局的方方面面。

家庭结构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相当长时期，秦汉魏晋时期家庭结构方面的研究基本停留在人口规模、世代多寡等层面上。在已经公布的走马楼吴简中，不少都涉及家庭问题。作者得出结论：孙吴时期既没有强制推行分家到户的家庭治理政策，也没有完全遵从家庭伦理的辈分尊卑，这说明说明孙吴政权并不关心单个家庭的内部构成，而是因时制宜，选择那些最有利于自身统治的政策加以实施。

以往学术界对孙吴政治的研究，集中在孙氏皇族、地方大族及相互间的复杂关系上。走马楼吴简中有大量行政记录，涉及诸多地方官吏的行政行为，为研究孙吴基层吏治、本土士族的政治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比如从田家新吴简中可以发现，孙吴时期基层官员徇私舞弊现象特别严重，这体现在收取租税上。他们有的明目张胆地多收或少收；有的混淆田地性质以少收租税；有的在账目上造假……如何治理基层吏治成为孙吴政权的重要课题。于是，一种叫作“中书典校”的制度应运而生，对各级官府长官和地方属吏产生了强烈的威慑作用，因遭到普遍反对，这种制度很快就宣布废止。

从这批吴简中可看出，孙吴政权的妥协与让步，使孙氏皇族与地方大族、基层属吏达成某种默契。但这种政治格局具有强烈的身份性和等级性，并依此进行权力利益分配，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受到的剥削压迫越来越重，只能起来反抗。最终，当西晋军队大举伐吴时，孙吴政权将土败逃，很快走向了崩溃。

不只是写字

——评《中国书法十五讲》

田纪茹

书法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熟悉是因为我们几乎都有提笔写字的经验，陌生是因为书法作为一门艺术，不单单是写字这么简单。对于书法不只是写字，具体体现在哪里，始终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而方建勋的这本《中国书法十五讲》，就从专业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出了通俗易懂的诠释，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审美与实践、法与道的关系这两个方面。

只要会写字，都可以算作有过书法的实践经历，然而审美的能力却不是靠写字就可以提升的，需要一定的理论知识和文化素养作为支撑。方建勋的这本书首先就从审美开始，从书法的前世今生讲到神、气、骨、肉、血，将一件件经典作品娓娓道来，在鉴赏经典的过程中，总结出书法在审美方面的一些核心要义。艺术和手工艺的区别就在于审美性，对书法来说，宁可“眼高手低”，眼力（审美）决定了手下笔墨的上限，否则再多的练习也只能沦为机械的描画重复。

学习书法的人或许都有体会，在写

字的过程中，渐渐也会了解到关于传统文化的许多其他知识：阴阳平衡、有无之用、虚实相生、文人趣味……写字就像一艘渡船，载着我们通往传统文化的更幽深处。这本书中无数次提到“字内功”和“书外功”兼具的观念。方建勋曾引用苏轼的“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为证，阐明了学习书法光是磨练技法（“字内功”）还不够，还需要气质和性灵方面的修炼，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书。这一观念也贯穿了这本书的始终，它不仅涉及到了结构、笔法、点画这些“字内功”，也强调了笔墨中所传达出的个人性情、传统美学以及时代风尚，为我们从比较全面的视角来看待书法这门艺术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窗口，也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传统文化艺术的全息性。

中国的“书法”到了日本，逐渐发展成了“书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书法”和“书道”这两个词是通用的，但若是仔细辨别，能够发现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差别，体现出对“书”的不同认知。“法”是多样的，而“道”是一一的。方建勋在这本书中，既讲解了各种各样的“法”，也从“法”中提炼出了万变不离的“道”。

俗话说“入门须正”，而今写书法的人不少，市面上的书法课也是五花八门，到底什么才是所谓的“正道”？每一个书法老师和学者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本书试图探讨这个问题。



《中国书法十五讲》
方建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首先，这本书所使用的插图大多是经过了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并且最后附上了一些经典碑帖的临习指导和视频，多看、多临这些经典，有助于培养基本的判断力——只有自己的基本盘稳了，在面对各种各样的观念和墨迹时才不至于迷失。

其次，基本盘稳了又很容易导致偏见，偏见会遮蔽我们领略更多美丽事物的目光，而方建勋在阐述一些“法”的时

候比较克制，充分尊重了书法的偶然性和灵动性，比如第五讲“结构”中是这样说字的“精神挽结处”的位置的：“精神挽结处——视觉中心，有可能在‘实处’即有点画处，也有可能‘虚处’，也就是在空白处。”

简言之，“精神挽结处”是因字而异的，我们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法”，但若是拘泥于此，就背离了最终极意义上的“道”。按老庄的观点，“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法”这种可以言说的道理是粗浅的，而“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精微的，为了粗而舍弃精，就是舍本逐末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死了。书法是反设计的技术，一本好的书法教材，应该是去中心化的，对可言说的“法”知无不言，而对不可言说的“道”保持敬畏，把想象和创造的权利还交给读者。

孙过庭《书谱》中有言：“人书俱老”，看完这本书，一方面可以增加一些关于书法的必备知识，另一方面更能让读者意识到书法不止于写字，还有更多可以深入学习和领会的东西。